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SSN 1672-9684,CN 51-1674/C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文体、史学与文章学：论柳宗元《封建论》的经典化
作者：李光生
DOI：10.16246/j.cnki.51-1674/c.20250710.003
网络首发日期：2025-07-11
引用格式：李光生. 文体、史学与文章学：论柳宗元《封建论》的经典化[J/OL].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6246/j.cnki.51-1674/c.20250710.003>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文体、史学与文章学：论柳宗元《封建论》的经典化*

李光生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 作为论体文, 柳宗元《封建论》自宋代便被确立为古文经典和文章学经典, 这其中吕祖谦《古文关键》功不可没。尔后诸家多从作家论、渊源论、章法论、风格论等方面巩固了其作为文章学经典的地位。然作为史学经典却因其思想议题牵涉了中国古代的两种基本政治制度(封建制和郡县制)而备受争议, 这种争议主要体现在“势”与“意”、“政”与“制”、“公天下”与“私天下”诸端。名人之推崇、科举之需求、古文选本之收录等固然是《封建论》成为经典的重要因素, 然“争议”也是成就其经典地位的原动力之一, 是其经典化曲折历程的突出体现。

关键词: 文体; 史学; 文章学; 柳宗元; 《封建论》; 经典化

所谓文学经典化, 简言之, 就是文学作品产生之后, 历代读者(包括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价值评价过程。由于文本的价值评价受诸多因素影响, 经典形成遂变得复杂, 其地位亦动态不居, 并非永恒不变。有些作品曾是经典, 后来被推翻, 如在六朝时期受到尊崇的谢灵运山水诗在宋代失去了其经典地位; 有些作品不为当时所重, 却被后代追认为经典, 如陶渊明诗歌在宋代的普遍接受并从此成为自然诗风的典范^[1]。也有些作品在艺术层面永葆经典地位而在思想议题层面却始终存在着争议, 如柳宗元的《封建论》。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学家对柳宗元《封建论》便多有关注, 然多局限于政治历史议题。近些年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李永姣的硕士论文《柳宗元〈封建论〉研究》^[2], 该文对柳宗元《封建论》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然并未涉及《封建论》的文学经典化议题。杨榕《经典论断的评析与认同——柳宗元〈封建论〉的接受与再接受》^[3]一文从接受史角度剖析了柳宗元《封建论》一文的经典性及经典化, 惜乎只涉及苏轼和高步瀛的论断, 关注点过于单薄。作为一篇史论文, 柳宗元《封建论》思想议题的争议性在于文章牵涉了中国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元理学家读书法与古文经典化研究”(24BZW054)

作者简介: 李光生(1973—), 男, 湖南郴州人,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宋代文学及文化研究。

古代两种基本的政治制度——“封建制”与“郡县制”，并旗帜鲜明地肯定了“郡县制”的历史必然。事实上，关于两制之争，柳宗元之前代不乏人。然自柳宗元《封建论》出，宋以后的文人学者几乎皆以柳文为基点，或肯定推崇，或质疑否定，不一而足。从某种程度来说，以柳宗元《封建论》为基点来讨论两制之优劣，本身就是《封建论》被确认为经典作品的一种标志；而对《封建论》思想议题的深度阐释与价值评价，也可说是《封建论》经典化曲折历程的一种表征。这种曲折历程，主要体现在《封建论》作为史学经典所招致的此起彼伏的争议。本文的意图还在于，通过对自宋至清的文人学者从文体学、史学、文章学等不同维度建构《封建论》经典地位的考察，试图在呈现各个时代审美风尚及其共通之处的前提下，探讨文学作品“何以经典”这一命题的复杂内涵。

一、文体经典的确立

封建制与郡县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主要政治制度，是中国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关于两制孰优孰劣的争议，自秦汉以来代不乏人。秦有王绾与李斯之争，汉有贾谊与晁错之论，而魏之曹叅《六代论》、晋之陆机《五等论》等则皆主封建。至唐代，两制之争更不绝如缕。《新唐书》载：“始，唐兴，疏属毕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时天下已定，帝与名臣萧瑀等喟然讲封建事，欲与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药皆谓不然。……颜师古独议建诸侯当少其力，与州县杂治，以相维持。然天子由是罢不复议。至名儒刘秩，目武氏之祸，……谓郡县可以小宁，不可以久安，大抵与曹、陆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4]3536-3537}其中李百药《封建论》云：“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5]1445}认为只有郡县制才能国泰民安。颜师古《上封建表》虽认为封建制与郡县制“皆不臻至理，两失其中”，主张“分置王国，均其户邑，强弱相济，画野分疆，不得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永无倾夺”^{[6]3226}，看似折衷之论，实则指出封建制乃古制，并不适合于今。

在讨论两制的文章中，柳宗元《封建论》无疑最有份量，也最具影响。安史之乱后，朝廷不仅未彻底平息叛乱，还把河北一带分封给曾经参加叛乱的将领，造成藩镇之祸。《封建论》极力主张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文中提到藩镇就等同于封建，反封建就是反藩镇，论古箴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文章的思想议题主要体现以下三点：首先提出“封建非圣人意，势也”这一核心议题。人类

最初结合为聚落，有聚落有群体就会有“争”，有争就需要“君长刑政”，于是“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学者张星久认为封建制在内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非来自圣人的有意设计^[7]。其次，通过历史事实证明郡县制优于封建制。柳宗元认为正是由于诸侯尾大不掉，最后导致周朝灭亡；秦朝灭亡在于“暴其威刑”，“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代以降，封建制往往导致国家分裂动乱，如晋朝“不闻延祚”，而唐朝“尽置郡邑”却已“垂二百祀，大业弥固”。^[7]第三，把封建制与私天下、郡县制与公天下联系起来，认为殷周实行封建制是不得已而为之，“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蓄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8]188}。这就是说，封建制是私天下，而郡县制是公天下，并由秦首创。实际上，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家天下(即私天下)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牢不可破的传统^[9]。柳宗元敢于闯进千百年来的思想禁区，为郡县制作道义上的辩护，透露出不凡的史学意识。

《封建论》作为文学经典的观念形成于宋代。宋初姚铉首推其功。其编选的唐代文学总集《唐文粹》卷三四“论甲”选入此文，并作为讨论封建制与郡县制文章的首篇。《唐文粹》只选古诗文，其他如四六、律诗一概不取，同时依照严格的文章标准，“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曼辞率皆不取”^{[10]3}。《封建论》得以入选，意味着其文学价值得到了宋初的普遍认同。

北宋“清江三孔”之一孔平仲从文体学角度初步确立了《封建论》的论体文经典地位，其云：“韩退之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11]69}韩愈论体文如《原道》《原毁》《讳辩》《杂说》等诸篇，从思想境界到艺术手法均达到了极高成就。孔氏之论，是否值得商榷姑且不论，然树立了柳宗元《封建论》的文体经典地位。苏轼引孔氏语，显然对孔氏评价深表认同。

真正奠定《封建论》论体文经典地位的是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古文关键》本质上是一部辅助举子科举考试的参考书，具有强烈的实用色彩。该书所选古文只限唐宋，且差不多只限于“论”体文，论体文将近 50 篇，约占总数百分之八十。“论”体在南宋科举考试中相当重要，“当时每试必有一论，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吕祖谦从写作实用的角度，重点关注文章布局命意、章法技法，

鲜及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该书“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之文凡六十余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故谓之关键”^{[12]1698}。《古文关键》选取包括《封建论》在内的六篇柳文，评点《封建论》“此是铺叙间架法”，即从文章结构布局进行解读。考虑到《古文关键》作为科举考试参考用书的性质，兼及吕祖谦在当时教育界及士人中的影响力，吕祖谦对《封建论》的评点势必在当时产生深远影响。

明代李贽对《封建论》亦推崇备至，认为“柳宗元文章识见议论，不与唐人班行者，《封建论》卓且绝矣”^{[13]672}。在李贽看来，《封建论》是柳宗元论体文成就超越其他唐人的标志。清代林纾更云：“《封建》一论，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14]71}众所周知，贾谊《过秦论》是历代公认的古文经典，《文选》首次选入《过秦论》，作为“论”体之首篇，尔后历代类书、通代古文选本皆收录该文，把它当作论体文的代表之作，如宋人王之望云：“《过秦》一论，议者以为书传之最善者。”^{[15]296}林氏认为《封建论》是毋庸置疑的古文经典。

显然，从文体学角度看，作为史论文，《封建论》的文学价值在宋代已得到了充分认识与肯定，尤其被苏轼、吕祖谦等文坛巨擘树立为论体文典范之作后，其古文经典的地位已然确立。

二、史学经典的争议

柳宗元《封建论》受到后世青睐，不仅因为文章本身价值，更与它被推为史学经典有关。《封建论》的史学经典之旅亦始于宋代。《新唐书》著录了《封建论》全文，范祖禹的史学著作《唐鉴》，相沿《史记》“太史公曰”的史学书写模式，以“臣祖禹曰”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该书卷四《太宗二》讨论“封建”事中，便引“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16]24}作为定论和经典评价。

真正确立柳宗元《封建论》史学经典地位的当属苏轼。《东坡志林》载：

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

^{[17]104}

苏轼把柳宗元《封建论》放在两制论争演变史的背景中考察，认为“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从史学角度突显其尊崇地位。不仅如此，苏轼还撰文《封

建》“附益”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说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苏轼擅作史论，《东坡志林》录13篇，多为独具新意的翻案文章，仅《封建》一篇乃“附益”为之，可见苏轼对柳宗元《封建论》史实史识的推崇。

南宋范浚、元代吴莱等人强化了柳宗元《封建论》的史学经典地位。范氏著《封建》一文，极力赞成郡县制：“臣窃因柳宗元之说，而极封建之弊，以为三代不可去，后世不可行。……且先王良法，历久而时不便，俗不安，莫能复行于后世者，固亦多矣。”^{[18]630-631} 范氏认为夏商周之兴不可废封建，而以春秋战国诸侯势大、西汉西晋封建之弊、唐代藩镇之乱等具体史实论证后世封建之不可行^[2]。

“时不便，俗不安”者，是对柳文之“势”的正面呼应。吴莱《胡氏管见唐柳宗元〈封建论〉后题》一文，针对南宋胡寅《读史管见》对柳宗元《封建论》的批驳，提出“变”之观点，以力挺柳氏之“势”。在此基础上认为“《管见》之说，守儒之常论也”^{[19]202}，体现出对《封建论》史学经典的强烈护持。清代吴闿生则认为“（苏轼对策）与柳子《封建论》所谓公天下私天下，及此文所谓‘禅不及己’、‘不得为天吏’等语，皆具有共和之精神，最是其学识卓伟处”^{[18]721}，也充分推崇柳宗元《封建论》的卓越史识。

然而，也是从宋代开始，《封建论》“是郡县非封建”的思想议题便招致诸多批驳反对，此以宋代廖偁、胡寅、胡宏、陈郁、楼昉，清代颜元、何焯、方苞、沈德潜、袁枚、龙启瑞等为代表。他们从各个层面批驳《封建论》中的观点，并肯定封建制的优越性。大要言之，主要集中以下数端：

（一）关于“势”与“意”（或云“道”）。基于柳宗元《封建论》“封建非圣人意，势也”这一核心观点，批评者们提出了截然对立的见解，认为圣人立封建并非不得已之举。如北宋廖偁云：

圣贤之立封建者，道也，非势也。……又谓汤武之不去封建者，实以封建者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以取天下而不去也。……是封建者，圣人所以理民以达道。……夫所谓势者，乃不得已之辞也。岂有取法天地，节制于人，而曰不得已哉！以此为势，则天下孰不为势？是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分皆势也，何止于封建而已乎？^{[18]25}

廖偁认为圣贤立封建，不是时势使然，不是迫于诸侯的贡献，而是顺应道

义。^[2]在此基础上批驳柳文之“势”，只是“不得已之辞”。南宋胡寅亦云：

诚知上古诸侯，已为民害，非圣人之意，不得已而存之，则洪水怀襄，民无所定，当时侯伯，必不能自有其国也。以尧舜禹三圣人不能因此更立制度，乃反画壤裂土，修明五服之法，一何其智之不及欤！宗元又曰：“自天子之（当为“至”之误）里胥，其德在人，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圣人意，势也。”夫为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绝，此仁之至，义之尽，不以为圣人之意，而归之于势，可乎？^{[18]92-93}

胡寅以为上古诸侯、圣人心怀天下，不可能明知封建害民而不改^[2]；而且天子至于里胥，凡有德于民者，民众必然奉养他们的子嗣。显然，廖偁之“道”（古之常道）、胡寅之“意”（仁义），其实是同一意涵的不同表述，皆指遵循儒家伦理道德的仁德爱民。

清代袁枚对此说得更为明确，其《书柳子〈封建论〉后》云：“夫封建非势也，圣人意也；郡县非圣人意也，势也。”^{[19]389}对柳宗元《封建论》进行批驳后，似乎意犹未尽，遂又作《再书〈封建论〉后》云：“柳子亦知先王之爱百姓甚于爱子孙乎？周公之命龟曰贤则昌，不贤则亡。武王灭殷，欲作宫于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曰：‘五行之山，天下之险也。使我有德，则天下之纳贡者远矣；无德，则天下之伐我者难矣。’此意也，非独自周公意也，即尧舜禹汤所以封建意也。”^{[19]391}在袁枚看来，君王仁人爱民之德就是封建之意（道）。

（二）关于“政”与“制”。这是两制之争的又一焦点。针对柳宗元《封建论》“（周事）失在于（封建）制，不在于政……（秦事）失在于政，不在于（郡县）制”的说法，批评者们结合史实予以反驳。胡寅认为“宗元又以封建为失制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是未悟制即政，政即制也”^{[18]94}，廖偁也认为：“周之乱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在此基础上，又云：“（周）封建之制，地有差等，禄有多少，礼乐器物，各有分派，是故下者不可上，少者不可多，降者不可升，无者不可有，执是而行，虽世未有乱者也。”^{[18]25}廖偁认为周朝有严格的礼教等级制度，倘若依礼法而行，则“世未有乱者”。而东周末年恰恰是礼崩乐坏，才致使问鼎射王诸事出现，最终国灭民乱，而这些与封建制没有任何关系。清代何焯更是毫不客气地说道：“柳子于周则曰失在于制，于秦则曰失在于政，是其语之最无征者。”^{[20]607}平心而论，柳宗元关于“政”与“制”的提法显得简单粗

暴，批评者们的意见更有理据和说服力。

（三）关于“公天下”与“私天下”。在儒家话语中，公代表公平、正义与多数人的利益，私则代表非正义与少数人（或统治者个人）的利益^[21]。柳宗元认为郡县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代表着“公天下”，而封建制则是“私天下”的象征。这一观点最为批评者们所诟病。廖偁云：“封建者，以天下为公也，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与天下共天下，守宰者欲以独制天下为心。公私之道昭昭矣，而公私之义固有差矣。”^{[18]25} 胡寅也说道：

封建，与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县，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谓三代圣王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为盗跖之事也；谓秦以封建公天下，是飞廉而有比干之患也，何不类之甚欤？^{[18]94}

胡寅认为夏商周分封诸侯，是公天下，而且商周均依靠诸侯之力才成就王业，分天下于有功诸侯是“以义处利，均天地之施”。湖湘学派开创者胡宏在讨论郡县制的弊端时更是措辞激烈，断言“邦国兴即天下安，封建废即天下乱……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顺天理，承人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不封建也者，霸世暴主所以纵人欲、悖大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贼也”^{[22]47}。

正如周积明等学者所指出的，清代学者们多以君主的动机行为是否合乎儒家仁义爱民的根本原则作为公、私的标准^[21]。如清初颜元断言封建制的基本精神为“公”、为“仁”，是“百圣大法”“民生天地，咸沐封建制泽”，郡县制乃出于秦始皇等后世人主“自私天下”，“任智力以自雄，收万方以自私”，造成“世世无穷之大祸”。因此，“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为‘公天下自秦始’之论，是又与不仁之甚者也”^{[23]86}。颜元认为在封建制下王朝一旦鼎革、中央政府失控，至少还有封国支撑，而不像郡县制下“闻京城失守而举世分崩”^[7]。虽说颜氏有些观点不免牵强，但其关注生民百姓的命运（公）远甚于专制国家的集权（私）这一点，显得立意高远颇有儒者情怀^[21]。

不仅如此，批评者们还对柳宗元的史实史识予以批驳，如沈德潜认为“柳州论封建，挟私意窥测圣人”^{[18]694}。柳宗元与他的众多批评者们是丹非素，各持一端，站在彼此自身的思想立场和文化背景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固然有合理成分，却也失之偏颇。如欧阳修云：“观诸儒之言诚然，然建侯置宰，如质文递救，亦不可一概责也。救土崩之难，莫如建诸侯；削尾大之势，莫如置守宰。”^{[4]3528} 朱熹

亦云：“柳子厚《封建论》，则全以封建为非。胡明仲（按：胡寅）辈破其说，则专以封建为是。要之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数如何。”^{[24]2680}

令人玩味的是，柳宗元之前持郡县论者大有人在，然自柳宗元《封建论》出，宋以后的文人学者多以此文为讨论基点，或肯定推崇，或批评否定。换言之，宋以后有关两制之争庶几围绕着柳宗元《封建论》思想议题而展开。一个重要原因显然在于柳宗元《封建论》的巨大影响，陈郁《藏一话腴》云：“儒者多以封建为圣人不得已，且自附于柳宗元之说，夫岂未之思乎？”^{[18]644}从政治史角度言之，柳宗元《封建论》支持郡县制最为彻底，因而也最具争议性，正如袁枚《书柳子〈封建论〉后》中云：“古论封建者，荀仲豫、陆机、刘颂、颜师古、魏征、李百药、刘秩、杜佑，皆能言之，而后人独爱柳子之说，吾故驳之。”^{[19]391}从文学角度言之，柳宗元自北宋被普遍接受而成为古文经典作家，在同类题材作品上，即便是像《封建论》这类因思想议题的特殊性而备受争议的作品相较其他非经典作家而言也可能受到更多关注。一定程度上，史学方面的争议性不仅没有动摇《封建论》的经典特质，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地强化。

三、文章学经典的共识

柳宗元作为古文经典作家，自宋以来备受称誉。《封建论》一文虽因其思想议题的特殊性招致诸多批评争议，然历代批评家对其文章学层面的经典意义却几无分歧。事实上，由于策论写作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宋人开始重视对包括《封建论》在内的古文名篇章法技法的研究，从写作和应试的实用角度去解读。吕祖谦首次通过评点从文章学角度对《封建论》一文进行阐释，确立了其文章学经典地位，尔后围绕《封建论》的文章学研究蔚为大观。兹分四点析论如下：

（一）**作家论**。在文学经典领域，作家及其作品往往相互依存，作家经典地位离不开其大量作品的典范意义，因而，批评家在评析作品时往往论及作家本人，有时还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以此突显该作家作品的经典地位。如上文李贽云“柳宗元文章识见议论，不与唐人班行者，《封建论》卓且绝矣”，通过柳宗元与其他唐人比较，突出《封建论》以议论见长的审美特质。自宋以来，世以“韩柳”并称，后人在评价《封建论》时也有意无意地涉及韩柳优劣的话题。如罗大经云：“柳之《封建论》《梓人传》《晋问》，则韩有所不能作。”^{[25]93}孔平仲则明确从文体角度比较道：“韩退之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

以《封建论》为例突显柳宗元在论体文方面对韩愈的优势。

（二）渊源论。柳文师承广泛，出入经史诸子，可谓渊源有自。柳宗元曾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到取法古人的两条路径，即：以五经为“取道之原”和“旁推交通”梁氏、《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太史公等。这显然是就大要言之。柳宗元古文文体多样，取法对象亦各有不同，如宋人邵博云“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而“张嶠舍人言柳子厚生平文章，专学《国语》”等等。

就《封建论》而言，后世批评家多认为取法《吕氏春秋》。清代冯班《钝吟杂录》卷四“读古浅说”条云：“柳子厚《封建论》本于《吕氏春秋》，子厚多学子书作文字。”包世臣《摘钞韩吕二子题词》亦云：“子厚《封建论》，永叔《朋党论》，推演《吕览》数语，遂以雄视千秋。”^{[26]34}有些评论家还具体指出取法所在，如元代陈霆云：“柳之《封建论》，则荡兵之说也。是知柳实用吕纪（《吕氏春秋·荡兵篇》）。”^{[27]14}试比较《封建论》和《吕氏春秋·荡兵篇》两段文字：

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又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8]187}

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28]158}

这两段文字无论从叙述方式、逻辑理路还是阐述观点都极相似，不难看出柳文取法乃至模仿《吕氏春秋》的痕迹，只不过后者更为精炼简洁，陈霆云“然就二者而观，则柳颇费词矣”，可谓确评。

（三）章法论。就文章学角度言之，后世批评家对《封建论》主要是从文本章法技巧、结构布局等方面来分析的。有些着重于整体统摄，如真德秀云“此篇间架宏阔，辩论雄俊，真可为作文之法”；有些则侧重于微观剖析，此以明代徐扬贡、清代储欣、何焯、方苞、林纾、唐文治、高步瀛等最为典型。限于篇幅，仅以林纾例之：

今就文论文，识见之伟特，文阵之前后提紧，彼此照应，不惟识高，文亦高也。入手，言封建非圣人意，归之于势，圣人不欲违势以戾民，故因势而成封建，正是圣人圆通广大处。……立一“势”字，既定全题之局，……是言势不可不封建，非圣人之意必欲封建，语至明显。……是决言封建之不可行，屹然山立。其下又将周之封建，秦之郡县，两两比较。……彰明显著，成案崭然，读之爽目。……结论清出“势”字，以应篇首，此是定法。^{[14]72-74}

对《封建论》章法结构条分缕析，是批评家接受并细读文本的一种体现，而通过批评家详细分析的文本更容易被一般读者所普遍接受并学习效仿，如唐文治云：“此等大文，起处极难，子厚必先定全篇格局命运，乃为此破空而来之法。中间千条万绪，脉络分明，末段‘或者又以为’下，绎如以成，与退之《原道》并峙争雄。‘公天下之端’一句，与《过秦论》‘仁义不施’二句，练气运机极相似，开学者无上法门。”^{[29]8350-8351}这大大促进了《封建论》的经典化进程。

不少批评家还以评点的方式对《封建论》的布局脉络用笔技巧进行解析。如《古文关键》对《封建论》一文概述道：“此是铺叙间架法。”“间架”仅是各种文章结构分析之一种技术名词。它指的是对一个论点逐渐进行发挥，用一系列的例子或者分论点来带出一个更大的结论。吕祖谦提供了夹行注和边注，在文中各行之间的小字注解表明了立论的各个步骤。吕氏标出了柳宗元总论封建制度历史之第一步，在讨论周代封建制度的文字之后标示出了“间架”一词。在讨论汉代的封建制度之后，“间架”又一次出现。这种基于文本的评点方法令读者在找到主要论点及文章大纲后，更留意文章章法结构和文笔等文章学层面的两个特点：过渡部分和精彩段落。吕氏特别让读者注意一些句子的功能，作者在那些地方“结一段意”、“封建本意”、“结周”、“难”（提出一个问题）、“应”（回应那个问题）、“再难”（提出更多问题）、“罪封建”等，以提醒读者注意论点的“起伏”，也就是作者如何展示关于历史事件截然相反的观点。柳宗元认为封建制的历史与人力之外的历史大势有关，某时期是否实行封建制不取决于当时是否有圣人或圣人意图为何。在某处柳宗元特意给这个论点提出质疑，即某些人可能认为应该一直遵循封建制，因为圣王主动延续这种制度。柳宗元随后反对此意见，认为当时的圣王不得已而行之，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真的相信这种制度的持久性。吕祖谦的评点进一步标出此文段落之间的灵巧过渡以及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语句。吕祖谦这

种注重章法结构的评点方式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文本而更具说服力,客观上也是对《封建论》文章学经典的一次建构。

(四) 风格论。韩愈评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駟)、蔡(邕)不足多也”,指出了柳文属于阳刚风格的一面,无愧知音。《封建论》一文雄辩滔滔,已有目共睹。自宋至近代,数百年来对此看法相当一致。兹举数例:

强词悍气,中间段络却精爽,议论却明确,千古绝作。^{[30]1259}

特其笔力峭拔,可以雄视一切,目无前人。^{[31]227}

作论横纵放恣,如柳州此篇,前后无敌焉。^[32]

深切事情。虽攻者多端,而卒不可拔。气甚雄毅,而按之实有虚怯处。^{[33]37}

体势雄峻,辞理廉悍劲古,宋以来无之。^{[34]459}

柳子之为《封建论》,其辞甚雄伟矣。^[35]

上述诸例,批评家们分别从笔力(如“悍气”“峭拔”“横纵放恣”“廉悍劲古”)、语言(如“辞甚雄伟”)、体势(如“雄俊”)等角度评析了《封建论》一文风格。尽管侧重点不尽相同,尽管有些批评家(如方苞、沈德潜等)对《封建论》内容颇有微词,却都指出《封建论》深具“雄健”之风,“实文章之豪雄”,不愧为阳刚美学范畴的经典文学作品。

自南宋以后,《封建论》被收录于众多古文选本。比如: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王霆震《古文集成》、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孙慎行《精选唐宋八大家文抄》、清高宗弘历《唐宋文醇》、徐乾学《古文渊鉴》、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方苞《古文约选·柳文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吴闿生《古文苑》、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等等,尤其是《唐宋文举要》把《封建论》置于入选21篇的柳文之首,可见在高氏看来,《封建论》代表了柳文最高成就,是不容置疑的文学经典。《封建论》被大量选本收录,让更多读者和初学者普遍接受并成为他们的学习典范,无疑巩固了其文学经典地位。

四、余论

自秦汉以来,封建论或郡县论者代不乏人,柳宗元《封建论》是捍卫郡县制最有份量的一篇文章。封建制虽在特定历史时期得以局部地顽强存在,郡县制在中国历史上延绵实行两千年却是不争之实。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政治思想领域,

郡县制并未获得无可争议的正当性，反而是“封建论”者因持守以儒家礼制、公道仁义等为主要内涵的道德法则和仁政王道而占据了更大话语权和道义优势。宋以后诸多文人学者对柳宗元《封建论》思想议题党同伐异般的深度阐释与价值评价，正好说明这一点。而其经典化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因其思想议题的特殊性变得复杂曲折。《封建论》之所以历久不衰并成为文学经典，固然有苏轼、吕祖谦等人的强力助推和后人的持续推崇，然不能否认，“争议”也是成就《封建论》经典的动力之一。这种“争议”，反映了北宋以来的文人学者对于家国政治的关心与参与意识，投射了他们自身的经世抱负与儒者情怀。

从接受史角度言之，苏轼的高度评价是《封建论》成为史论经典的关键。有宋一代，科举重试论。应举子之需求，《封建论》首先被《古文关键》收录其中，作为“论”之典范被广泛阅读接受并成为古文经典。其后被众多古文选本收录，这大大推动了《封建论》的经典化进程。自宋以来的批评家们开始从写作和应试的实用角度重视对《封建论》的文章学研究，不仅分析作家本人、文本源流及风格，更注重以评点方式对文本章法技巧的研讨与评赏，这对《封建论》经典地位的巩固无疑至关重要。

总的来说，柳宗元《封建论》的经典化就是它的文体、史学及文章学价值被不断阐释、评价并确认的过程。这一过程曲折复杂，呈现出两面性，历代批评家如楼昉、方苞、沈德潜等对作为史学经典的《封建论》争议滔滔，却也公认其是无可非议的古文经典。

参考文献：

- [1]吴承学.《过秦论》：一个文学经典的形成[J].文学评论,2005（3）:136-145.
- [2]李永姣.柳宗元《封建论》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 [3]杨榕.经典论断的评析与认同——柳宗元《封建论》的接受与再接受[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1（4）:78-80.
-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七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董诰，等编.全唐文[G].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六二三[G].北京：中华书局，1966.
- [7]张星久.国家结构形式问题上的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表达——论中国帝制时代“封建论”的

- 思想逻辑与发生背景[J]. 政治学研究, 2008(5):53-63.
- [8]柳宗元. 柳宗元集校注[M]. 尹占华, 韩文奇,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9]冯辉, 齐书深. 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J]. 学习与探索, 2001 年(3):126-130.
- [10]姚铨. 唐文粹:序[M]. 许增, 校.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 [11]柳宗元. 柳宗元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2]永瑤. 四库全书总目: 卷一八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3]李贽. 藏书·儒臣传·柳宗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4]林纾. 韩柳文研究法[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
- [15]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 全宋文: 第 197 册[G].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 [16]范祖禹. 唐鉴: 卷四[M]. 吕祖谦, 音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7]苏轼. 东坡志林: 卷五 [M]. 王松龄,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8]吴文治. 柳宗元资料汇编[G].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9]袁枚. 袁枚全集: 卷二三[M]. 王英志, 主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20]何焯. 义门读书记: 卷三五[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21]周积明, 田勤耘. 清人对柳宗元《封建论》的批评[N]. 光明日报, 2008-08-03(7).
- [22]胡宏. 胡宏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23]颜元. 习斋四存编[M]. 陈居渊, 导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24]黎靖德. 朱子语类: 卷一〇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5]罗大经. 鹤林玉露: 甲编卷五[M]. 王瑞来,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6]包世臣. 艺舟双楫: 论文二[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 [27]陈霆. 两山墨谈: 卷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28]吕不韦. 吕氏春秋译注[M]. 张双棣, 等译注.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29]唐文治. 国文经纬贯通大义: 卷 7[M]//王水照, 主编. 历代文话: 第 9 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30]高海夫, 主编. 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
- [31]沈德潜. 唐宋八家文读本[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 [32]浦起龙. 古文眉诠[M]. 乾隆九年(1744)钞本.
- [33]方苞. 广注古文辞类纂[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5.

[34]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5]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卷一[M].光绪四年(1878)刻本.

